

从文本旅行到文化杂合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读者的译介路径探索

李沐子

(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重庆 401120)

摘要:如何通过翻译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的传播,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读者需要解决的症结性问题。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视阈下,异质文化间的差异在文化的“第三空间”内协商、交流并融合出新,从而生成“非此非彼”又“亦此亦彼”的新生事物,异质文化间的差势因而得以消解。“第三空间”理论为中国文学的外译提供了一种更为适用的“杂合”的文化观与方法论,我们应从翻译策略、译介心态、译者群体三方面进行探索,促进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

关键词:中国文学;译出文学;文化身份;“第三空间”;文化杂合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3-0117-06

0 引言

随着中国文化自信自强的建设脚步不断向前迈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迫切性受到了众多学者前所未有的认同。我们需要承认的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多元系统中,仍暂时扮演着相对边缘和弱势的角色。要同世界分享中国文学的精华,对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就是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在本质上充当了人们了解源语文本文学及其所反映的文化的媒介,它是中国文学及其所反映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不仅发挥着将汉语转换为其他语言的作用,还肩负着民族身份构建与中国形象塑造的重任。如何在西方主导的强势文化面前摆正中国的自我文化心态,让中国文学走出暂时的封闭圈,改变中国译出文学边缘身份的命运格局?如何通过翻译的斡旋,调和中外语言文化的矛盾,实现文化之间的流传和融合,推动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这是中国文学“走出去”需要解决的症结性问题。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跨语际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早已深刻影响着翻译的内涵、实践与相关研究。翻译不再仅是将两个语种相转化的工具性过程,而是一个文化杂糅的系统性产物;不仅涉及文本的跨语际旅行,更要求文化的跨语际杂糅。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视阈下,在两种异质文化交流的场域中,存在一种间隙性的文化“第三空间”。霍米·巴巴(Bhabha, 1994: 114)指出,在这个居间的罅隙空间,代表不同民族、文化、利益的主体交互重叠,主体间性和集体经验得以对话。这一概念打破了二元对立的局限性,对政治、文化差异等进行了再次分割与定义,创造出一种新式批评(张

收稿日期:2023-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效能、影响与机制研究”(19XWW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沐子,女,西南政法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法、翻译理论研究。

引用格式:李沐子. 从文本旅行到文化杂合——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读者的译介路径探索[J]. 外国语文, 2023(3): 117-122.

格兰等,2021:24)。可以说,文化“杂合”方式是促进文化新生事物的发展与革新的可行途径。“第三空间”理论不失为促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读者提供了一种潜在的翻译文化观。

1 中国文学译介实践的现实困境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文学在世界多元的文学系统中还暂时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处于一种虚弱甚至缺席的身份状态。“纸托邦”(Paper Republic)的创始人、美国翻译家埃里克(Eric)就曾指出:“中国人非常急切地向外推广本土文学,而海外读者根本没有‘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海外读者可能看过一两本中国作家的书,但绝谈不上对整个中国文学有什么概念和看法。……海外从出版社、媒体、学者到普通读者大部分的读者对于中国文学一无所知,也不是抵制,也不是不喜欢,就是个空白。”(胡安江,2017:77)这与中国文学的外译实践不无关系。在域外文学的译入方面,我们一直孜孜不倦且成绩斐然,而在中国文学的外译方面,我们虽然勤勉不懈却始终步履艰难。可以说,在推动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方面,中国文学的外译实践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虽然全球化加深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但不同文化之间将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隔阂,通过翻译来进行文化精髓的深刻分享并不容易。文本旅行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难免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文化抵抗。文化距离所造成的文化生疏感会阻碍翻译对文化流转的实现,影响译文对于原文中文化元素的切实传达。除了文化差异的影响之外,中国文学外译的策略也制约了中国译出文学的质量,进而影响了海外读者对译本的热爱。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外译的相关实践一直纠缠于单纯的“源语中心论”,即译者被要求专注于在语言层面的对等与再现,尽可能忠实和准确地进行文字层面的转换,而相对忽略了深层次的文化意涵的传达,进而生产出一些所谓的“合格的译文”。但这些“合格的译文”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难以吸引外国读者,其后果就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并没有通过这些“合格的译文”而走出去,“其最后的读者可能就是孤芳自赏的我们自己”(胡安江,2020:80)。

当然,除了翻译的影响,中国译出文学未能在世界读者中建立起广泛的身份认同,从根源上讲是由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话语权势差所决定的。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艺术反映,它受到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由于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西方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演变出力量强弱对比。西方世界以文化知识为载体,通过文化创作主导着全球文化话语权的发展趋势。西方的强势文化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按照自己的文化偏好或意识形态来解读弱势文化,甚至占据弱势文化的生存空间,这让暂时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受到很大的局限。

2 中国文学译介路径的理论基础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译出文学要在国际上广泛传播,我们就需要在强势文化面前摆正自我的文化心态,走出自身的封闭圈。在此背景下,探索消解文化霸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post-colonialism)无疑为中国文学译介提供了重要思路。

后殖民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在这个场域中,所有的理论探讨都基于一个历史事实,即植根于欧洲殖民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根据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主张,西方世界以意识形态为载体,通过文化创作,利用其在文化知识方面的优势,对东方国家的文化领域进行殖民霸权。据此,后殖民主义的话语主要是关于文化差异的理论研究。这种文化差异原本主要是指原宗主国与殖民地及第三世界之间的不同于殖民主义的复杂关系,后来也被学者用于阐释广义上的基于“西方中心

主义”或基于西方文化霸权所产生的文化势差的种种问题。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创立并阐释了一系列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概念,包括“间隙的”或“阈限的”“之间的”“第三空间”等。其中,“第三空间”的概念强调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叠,并且跨越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界线,在理论层面上使两种文化的矛盾不再尖锐。

巴巴通过构建一种超越种族差异和阶级差异的异质文化认同的“阈限性”(liminal)场域,创造出处理文化差异中的矛盾与冲突的“居间”场所,其作用就是生成一种边界融合所特有的张力。巴巴提出,异质文化相交流的结果,是生成一种新的文化身份,这是一种“杂合”的身份。不同的文化相互接触时,是不可能完全保持各自的纯粹性的,但不同的两种文化并非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相反,两种异质文化相互交融、杂糅,于是在二者的居间位置“会打开一片‘间隙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一种间隙的时间性,它既反对回到一种原始性的‘本质主义’的自我意识,也反对放任于一种‘过程’中的无尽的分裂的主体”,它“既非自我也非他者,而是那之外的某物”(Bhabha, 1996: 28, 204, 206)。这不是一种文化的同化过程,而是通过异质文化的边界协商,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利益群体’或社会运动的文化”(生安锋, 2004: 30)。

巴巴将“第三空间”定义为“处于文化渗透之复杂状态中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种不确定的和模棱两可间的界线”(王宁, 2006: 148)。基于这种属性,“第三空间”的理论可以用来探讨被忽略、受局限或被压抑的文化场景,并重新使其发展。在“第三空间”这个中间地带,弱势文化的发展方式并非是对强势文化进行完全的复制,而是通过一种“模拟”(mimicry)的方式,进而从内部解构强势文化,以自我的文化理念和传统以辅之,其结果也同时解构了既定的文化身份,从而产生“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文化新生事物。文化的势差因此得到消解。这一新生事物即为文化杂合体,它兼具两种文化的特质。

所以,“第三空间”从理论上为异质文化的融合出新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思考。不同的文化以及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事物要相互理解,共同发展,很难在一种单一的文化内部实现,而是需要在一种更加包容的空间里,以协商的方式达成临时的认同。这一“文化之间”的世界,追求一种“部分性”文化的重新整合,使各种固有的文化因素在相互协商的过程中获得新的杂合的身份。

3 中国文学译介路径的可行方案

翻译本来就拥有天然的双重视域,既包括熟悉的本国文化因子,又带来陌生的异国文化元素,创造出译文的“转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叙事特征,是一种文化解构与建构的过程。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解构了殖民文化的“非此即彼”的根基,在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础之上,构建起一种“亦此亦彼”的新身份。这一理论为中国文学的外译实践提供一种基于文化杂合的文化观和方法论。在“第三空间”理论的视阈下,要通过对中国文学外译的策略、心态、群体的调整,激发海外读者对中国译出文学的热爱,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一种“杂合”方法论来实现。

3.1 “杂合”的翻译策略

对于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之争,在译界和翻译研究中由来已久。两种翻译策略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和译介意图,各有优劣。但在现实的翻译活动中,此两种策略并非绝对对立的关系。为了促进中国文学的传播,对中国文学的外译,可以采用同时兼有归化与异化的“杂合”策略,并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

异化派的学者认为,对于弱势文化的文学作品而言,只有在翻译中采用异化的策略,才能最有效地存留作品的异域文化特色,以此为武器冲击和瓦解强势文化的地位,因此以刘易斯(Philip Lewis)、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反常的忠实(abusive fidelity)”(王东风,2008:75)的概念。但异化策略却常常被指有太过刻意营造“异国情调”之嫌,这样的语言特征反而迎合了西方世界猎奇的文化心理,并且符合西方有关东方的“文化他者”的刻板印象。因此,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归化式的译文实际上更易于被海外读者所接受和喜爱,其传播潜能和颠覆力量不容小觑。事实上,翻译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有效的交际意图,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应该把异质文化用目标语读者可接受的方式和语言习惯恰当地表达出来。

以归化的方式译介中国文学能够为中国文学的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对莫言文学作品的翻译即是一个实例。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文学作品的翻译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莫言的文学创作能在国际上取得成功,作为译者的葛浩文功不可没。诚然,葛浩文的译文也引起不少争议,学界不少人认为其翻译有“连译带改”(周满珍,2017)的嫌疑。然而,葛浩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充分考虑了目标读者的期待规范,照顾到了西方读者的文化偏好以及英语文学的某些特质,将现、当代中国文学以极其生动、鲜活的状态展示给西方的读者,他要让母语为英语的读者群体热爱他的翻译作品,他是为美国的出版商和美国读者而写的(Stalling,2014:7,9)。有学者如此评价葛浩文的翻译:“葛浩文与其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译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注重英文的风格。在葛浩文登台之前,想探究中国小说的读者常常得忍受毫无生气的翻译,原作的活力很少得以体现。”(陈定刚,2019:47)因此我们可以说,以归化的方式从西方的文学形式中寻找一些文化试验因子,是对原文本的文化资源的丰富,这是一种可行的策略。当然,译者也需要把握好尺度,不可把一时的变通当作永恒和唯一的价值追求。

实际上,不论是过于求同还是过于求异,都违背了通过平等对话、相互比照而达到文化认同的初衷。这样看来,“居间”的“杂合”翻译策略无疑值得期待。基于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初衷,则应以归化为主,异化辅之,在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审美偏好和“可接受性”的基础上,保留和传播中华文化精华,在促进审美迁徙中不忘文化的基础与根基。具体而言,可以在语言习惯与行文方式等方面更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满足译文的流畅性,使外国读者易于接受;而在彰显中国文化意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与表达的部分,则可以采用异化的策略,让读者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存在。

3.2 “杂合”的译介心态

译者应该秉持一种兼有世界性与民族性,并且兼顾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与目标读者的文化期待的“杂合”的译介心态,让译文的新的文化身份在中、外二元文化的浸淫当中树立起来。基于促进中国译出文学国际传播的初衷,译者要充分考虑目标语语境的接受效率和汉语的国际影响力构建问题。因此,译者应以世界性的价值取向为核心,以民族性的理念为补充,同时将读者的文化期待置于首位,但也要严守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的底线。译者要建立起源语和目标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和谐关系,本着“交际”与“对话”的原则,构建中外文学与文化的互文关系。

译者首先要兼具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译介的价值取向,并且将世界性的价值观放在首要位置。在跨文化的语境下,翻译不是简单的工具性过程,而是发挥着传递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对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译者作为某种特定文化的产物,来自其自身文化背景的先入之见构成了对作者的文化理解基础,译者本身会带有一种文化的“先认知”。因此在从事翻译活

动的过程中,译者难免会出于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目的来处理对原文本的翻译。为了能够使中国译出文学受到世界读者的热爱,译者就要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世界性的心态来进行翻译活动。因此,译者可以尽量以一个文化“局外人”的身份审视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撇开自身文化偏好的影射,以相对中立或“居间”的视角对原文本进行再阐释,这样才可以相对客观地在传递原文本的文化特征的同时,产出具有易于目标读者“可理解”和“可接受”的翻译作品。

除此之外,译者还应兼顾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与目标读者的文化期待。在具体翻译活动中,译者需要对将要进入目标语文化场域的源语文本,进行“有差异的阐释”,即深入到文化意义层面,结合目标语的语言特点,进行语言的“再创作”,将原文的写作意图和原文中的文化意涵结合目标读者的文化偏好,展现在译文中。“再创作”的目的是获得某种糅合了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阐释,创造出兼具双重文化叙事风格的译文。

3.3 “杂合”的译者群体

在译者群体的力量储备方面,可以采用一种“杂合”的组成方式,将母语为中文的中国译者与母语为目标语的汉学家作为主要的译介人才力量。因为,仅仅强调母语为中文的中国译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透彻理解,并不足以确保译本在目标语的文化市场上的接受和传播,而如果盲目地依赖汉学家的翻译,也很容易招致危险,反而使中国文化被强势的西方文化所吞噬。因此,我们需要探索一种折中的道路,一种“杂合”的模式,既不能完全依靠中国译者,以免滋生封闭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不能不加甄别地将传播中国文学的历史任务完全交到外国学者手中,以免在无意间挫伤了中国的文化话语权和文化自信。

从中国文学外译数十年来的实践情况看,基本是由中国译者担当重任的。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汉语为母语的中国译者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当然,这其中的难度不容小觑。因为,根据译界常规,从外语向母语的正向翻译才是理想的翻译方向,这种方式可以确保译文的自然流畅和可读性;而中国译者要将中文译成外语,其实是在做逆向翻译,而这种翻译一直被视为是一种另类翻译活动,译文的质量往往受到质疑。然而,在积极传播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逆向翻译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这就需要中国的译者积极提高汉语和目标语的双语能力,更加熟练掌握目标语的写作习惯,广泛了解中国文学中的传统和典故,磨炼在两种文化之间交流的能力,提升对两种文化的敏感程度以及理解运用能力,并且从文化审美、文化心理、文化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丰富对目标语文化背景的了解,从而捕捉目标读者的文化偏好与“可接受性”,缩短目标读者与译本的心理距离,力求做到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骨,用鲜活的、酣畅淋漓的译文去吸引和打动更多的读者。

此外,西方的汉学家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汉学家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的巨大成功,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汉学家推动中国译出文学国际传播的潜能。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确实有不少西方的汉学家深切热爱着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并且热情地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传播给更广泛的读者群体。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经过汉学家的成功译介,得以在世界多元的文学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正如黄友义指出的那样:“中译外绝对不能一个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鲍晓英,2013:64)中国译者与汉学家如果能够优势互补,让更多的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充分”且“可亲近”地展现在海外读者的面前,得到海外读者的认同和喜爱,树立起“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国际形象,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方能行稳致远。

4 结语

中国文学的外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要思考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出去”,不应在固有观念中寻找答案,而要从有担当的文化强国的广阔胸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决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的高度来考量。我们肩负着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优秀文学作品与世界分享的神圣使命,我们应该更加主动地走向他者。文化交流的必要途径就是翻译。译者在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相交流的“第三空间”中,塑造译文的全新文化身份。事实上,文化全球化要求中国译者重新审视已有的翻译观念和相关实践。我们要审时度势地不断调整翻译策略和译介心态,培养译者群体,走出封闭的地方主义。在翻译的语境下,“第三空间”理论构想出一种文化居间与融合出新的场域,这有益于消减孤立,抗击文化隔离,消解文化霸权,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适应和兼容,强化中外文化之间的流转。“第三空间”理论对于推动中国文学走进全球读者的视野、实现中国文学的世界表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Bhabha, H.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habha, H. K. 1996. *The Postcolonial Question: Common Sk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talling, J. 2014. The Voice of the Translator: An Interview with Howard Goldblatt [J]. *Translation Review* (1): 1-12.
- 鲍晓英. 2013. 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访谈录[J]. *中国翻译* (5): 62-65.
- 陈定刚. 2019. 翻译与文化: 语言接受性的流转[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耿强. 2014. 中国文学走出去政府译介模式效果探讨——以“熊猫丛书”为个案[J]. *中国比较文学* (1): 66-77+65.
- 胡安江. 2017. 中国文学“走出去”: 问题与思考[J]. *中国翻译* (5): 77-80.
- 胡安江. 2020. 从文本到受众——翻译与文化研究论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生安锋. 2014.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 王东风. 2008. 译学关键词: abusive fidelity [J]. *外国语* (4): 73-77.
- 王宁. 2006.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 周满珍. 2017. 《译林》创办人李景端: “连译带改”是文化不自信[N]. *长江日报*, 2017-07-04 (20).

From Text Travel to Cultural Hybridity: Exploring the Path of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wards World Readers

LI Muzi

Abstract: How to better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translation is a crucial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for Chinese literature to reach the world readers. In the context of post-colonial theory, the differences in diversified cultures are negotiated, exchanged and fused into new ones in “the third space”, thus generating newly emerging things that are “neither one nor the other” and “both one and the oth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es are thus dissolved. The theory of “the third space” provides a more applicable cultural view and methodology of “hybridity”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e should explor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strategy, the mentality, and the translator,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Key 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ed literature; cultural identity; “the third space”; cultural hybridity

责任编辑: 陈宁